

遂宁解放四十周年特辑



遂寧文史資料

《遂宁解放四十周年特辑》

编 审 人 员 名 单

主编：戴玉印 何宁康
编辑：刘安治 杨杰明 李剑华
张茂琴 何宁康 周 立
戴玉印

纪念遂宁解放四十周年

祭以酒戰斗

永存酒光輝

周祐法

目 录

题词	中共遂宁市委书记 遂宁市政协主席 周裕德
前言	彭大昌(1)
进军西南 逐鹿巴蜀	
——解放军进军西南作战记略	戴玉印(3)
关于解放遂宁的日记	高治国(14)
解放家乡纪实	张 纯(16)
一场特殊条件下的战斗	
——遂宁解放的日日夜夜	杨 俊(20)
迎接遂宁解放纪事	李俊烈(34)
对遂蓬武装斗争的回忆	雷 云(口述)李荣植(整理)(39)
我参加武装斗争的经历片断	蒋含光(43)
地下斗争回忆片断	张茂琴(51)
遂宁游击队迎接解放活动记略	吴逢春(整理)(56)
我在游击队的生活片断	刘钧铭(62)
遂宁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始末	
中共遂宁市委统战部 中共遂宁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	(65)
忆遂宁县解放委员会	刘安治(72)
王子度同志对遂宁县解放委员会的一次工作部署	周 立(90)

记遂宁县临时治安委员会片断	黄德人	(92)
解放前夕民盟遂宁组织迎接解放简况	阳西垣	(94)
解放前夕我在农民中做的一些工作	郑宗尧	(97)
解放前夕涪江女中的一些革命活动简况	周仁传	(99)
解放前夕遂宁县女中护校纪实	李映秋	(102)
解放前夕遂宁电话管理所护所记实	李国梁(整理)	(106)
遂宁县解放初期工作的回顾	范 艾	(109)
181师进驻遂宁组织军分区	张守礼	(116)
安邑县干部南下纪实	贾 岗	(118)
参加遂宁军管会工作回忆片断	周树淮	(122)
首届遂宁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概况	刘安治	(125)
难忘的战斗		
——西眉区征粮剿匪记	席先德	(129)
老池乡樊哈山剿匪亲历记	夏怀安	(142)
拦江剿匪记	易震东 喻玄华	(147)
解放初开办遂宁“大众书报社”的始末	李映秋	(150)
后记	遂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	(153)

前　　言

政协遂宁市委员会副主席 彭大昌

1989年10月1日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四十周年大庆的日子。12月8日，又是遂宁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日。为庆祝这两个不平凡的节日，政协遂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了本文史特辑，这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。

这本特辑，是参与解放遂宁的人民解放军指挥员，遂宁地下党的部分同志，与共产党长期合作、并肩战斗的民主党派的一些同志和各界进步人士，以及为建立和巩固新的人民政权工作过的同志，对四十年前那段难忘岁月的回顾。

出版这本书，为的是通过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不少革命先烈抛头颅、洒热血、含辛茹苦、历尽艰难，最后，在各界爱国人士配合下，取得我市解放的一段革命史，来透视中国革命的来之不易，以历史的事实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11亿中国人民，为了国家的主权、独立和发展，为了自身的生存，为了真正的民主自由，经过多年的艰难曲折，才选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选到了社会主义制度，这绝非偶然，而是在中国这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历史的必然。

40年来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，更是成就卓著，举世瞩目。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：全市的社会总产值、国民收入、工农业总产值、国民生产总值

较之1949年都有很大的增长；人民的生活、教育文化、科技卫生等各项事业也有了巨大变化，事实雄辩地证明，没有社会主义，就没有中国的发展！

当前，全市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坚持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工作，愿读者能从《纪念遂宁解放四十周年文史特辑》中受到一定的启迪，牢记历史的教训，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，继续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干社会主义。按照“三步曲”，在下世纪中叶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、民主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。



进军西南 逐鹿巴蜀

——解放军进军西南作战记略

戴玉印

蒋军退踞西南 妄图垂死挣扎

自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，“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”。当时国民党政府仍坚持反共、反人民的内战立场，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谈判条款，顽抗到底。为了祖国的和平、统一、独立和富强，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解放军总司令朱德，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，向全军发出了“向全国进军的命令”，我数百万房兵秣马防守在长江北岸的解放军健儿闻风而动，于当日下午八时许，在西起湖口、东至江阴五百余公里的江面上万舸争发，横渡长江，一夜之间，势如破竹，摧毁了国民党军经营数月的长江防线。四月二十三日，攻占了国民党的首府南京，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。但是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仍不甘心自己失败的命运，继续纠集、搜罗了残存的150余万军队，及其党政首脑机关，撤迁华南和西南地区。“迁都”广州，而后重庆，妄图作垂死挣扎。当

时，国民党的主要依靠力量是白崇禧、胡宗南两支部队。他们兵力最多，装备精良，退踞在华南和西南地区。以白崇禧集团为首，和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所部，组成“湘粤联防”，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。在西南地区，以胡宗南集团为首，所部扼守秦岭天险，严防解放军入川。蒋介石曾面喻川、康（西康省）、云、贵诸省将领：“要精诚团结”，“密切合作”，组成“大西南防线”；若解放军进攻西南，“要御共于境外，歼共于境内。”这是蒋介石退守西南以四川为基地，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战暴发，依靠帝国主义的干预和支援，妄图“收复失地”的完整的战略意图。倘此计不成，则由云南逃往国外，盘踞台湾，待国际局势变化，反攻大陆，东山再起。

层层设防 阻挡解放军入川

我三大野战军（二野、三野、四野）横渡长江之后，根据分工，各自向主攻方向进军。三野四野主要负责解决华东华南诸省蒋军，二野在华东、华南作战后，意向西南。一九四九年七月，我第四野战军主力，在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协助下，向白崇禧集团发起了强大攻势，一举突破了“湘粤联防”，白崇禧所部闻风而逃。十月十四日，我军乘胜解放了广州。蒋介石失去华南依托之后，又“迁都”重庆，妄图在加强西南防务上孤注一掷。为此，他先后于八月、十一月两次在重庆召开有高级干部参加的“御前会议”，研究部署西南防务，其重点是对四川的防守。蒋介石及其幕僚们判断：解放军入川不外从北和东两个方向，川东方向，山高峪狭，地形复杂，不便用兵。由此入川的可能性不太大。从北方来看，甘陕南部背靠老解放区，便于

支援；又横贯陇海铁路，运输方便，人力物力易于集中，势必采取“邓艾伐蜀”之计，突破秦岭之后，可直取成都。川南面临鄂、湘、黔防线，地处丛峦叠嶂，路岖道弯，运输困难，不利大兵团作战，解放军作战不可能绕山弯水舍近求远。根据这一判断，国民党军部在兵力部署上基本上是南轻北重，东面次于北面。当时散布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还有十个兵团（其中有两个兵团是四九年十一月之后组成）、三十九个军，加上地方和杂牌部队，共约九十万之众。胡宗南集团主力第五兵团（司令官李文）、第十八兵团（司令官李振）的八个军，倚秦岭主山脉为依托，沿成县、徽县、留坝、佛平、镇安一线构筑防线；以第七兵团（司令官裴昌会）的六个军，沿白龙江、米仓山、大巴山一线构成第二防线，阻击解放军从甘陕南部南下入川。在川东南方向，以宋希濂集团的二十兵团（司令官陈克非）及第十四兵团（司令官钟彬）等六个军及其他地方部队在鄂西、湘西之巴东、鹤峰、乾城一线设防，并与川东巫山、巫溪、方县一线防守孙震集团的第十六兵团（司令官孙良诚）的三个军联防组成“川鄂湘边防线”，阻止解放军由鄂湘南部入川。在四川境内，有罗广文的十五兵团部署在南充、达县一带作预备队。在川南地区，二十一军、七十二军于十一月初组成二十兵团（司令官郭汝瑰），驻守泸州、宜宾、内江、沱江一线作机动力量。杨森部第二十军、邓锡侯部九十五军、刘文辉的二十四军，分别驻守重庆、成都、雅安、康定等地负责警备任务。在南线，仅有谷正纶部的十九兵团（司令官何绍周）的两个军于贵阳、新晃一带设防，扼守黔东门户。在云南境内，仅有第八兵团（由第八军、二十六军组成。司令官由国民党军副总司令汤尧兼任），布防在桂、黔、滇边界地区及滇越公路

沿线，主要任务是对付我桂滇黔边纵游击队和对卢汉部队的监视。他们除加紧军事部署外，在四川还研究制定了稳定政局、加强地方治安的“应变”措施：一、在现有管区内加强治安管理，积极防止“暴民”活动，特别是对华蓥山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要坚决镇压；二、加紧征兵、征粮，扩充兵源，加强各地团、师管区工作，充实领导人员；三、扩大、建立、健全地方保安团、队组织，笼络、武装各色反动人物，增强反共力量；四、在军校开设游击训练班，待解放军入川后，进行暴乱，开展游击战争；五、利用和发展特务组织，深入基层，进行隐蔽活动，刺探情报，监视群众行动；六、为使更多的国民党员效忠蒋介石，充当内战炮灰，胡宗南还制定武装全川国民党员的计划，要求每个县至少成立一个营的武装，县党部书记任营长，每一个专署成立一个师的武装，专员是国民党员的要兼任师长，不是党员的由省党部指派省委委员担任。同时还要求武装起来的部队的各级军官，必须是国民党员，妄图从组织上、思想上加强控制，驱使更多的人作内战的牺牲品，保持、巩固在大陆上的一块最后反共割据。

斩断“大西南防线”智取山城

当蒋介石在编织建立“大西南防线”的美梦之时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如何解放大西南的问题，早就胸有成竹，“帷幄运筹、决胜千里”，以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，巧妙地安排了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：“欲消灭胡宗南的军队及川康诸敌，非从南线进军断其后路不可。”于是，在一九四九年七月，决定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率领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军西南，经云、川、康、贵诸省，命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贺龙率

领华北十八兵团和一野部分部队由甘陕南下，协同二野入川作战，共同解放大西南。与此同时，命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（陈赓部）协同第四野战军，由武汉地区南下，解放两广，然后西进昆明，夺取全滇，配合兄弟部队，完成解放大西南的任务。为麻痹蒋介石，不使其过早发觉我军入川的作战意图，稳住在川的几十万国民党军不让其逃脱，以聚歼于四川境内，我军摆下了“迷魂阵”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采取北佯（攻）、东击、南进大迂回、大包围、断其退路之后，回师北上，进军四川的战略。北线我军同南线部队完成包围、切断后路之后，再出击南下，然后南北合击，“关门打狗”于四川平原。各军在行动时，声东击西，使敌人难于捉摸。如我二野三兵团主力离开南京向西南进军时，借道陇海铁路，兵至郑州，刘伯承司令员发表解放西南的讲话，新华社当即播发了这一新闻，虚张声势，摆出二野西进由北入川作战的架势，迷惑敌人。事实上，三兵团主力已由河南隐蔽南下湖北，以四野番号由鄂向湘西运动，枕戈待命，以期完成向黔迂回、包围之后挥戈北上，攻取南川的重要使命。此时，我北线大军已集结在甘、陕南部，佯攻作战，造成我军由北而南入川之势，吸引、滞留了胡宗南在北线更多的防守力量，避免敌人过早南逃。

在上述部署全部完成之后，于是年十月趁四野发起衡宝战役，向两广腹地进军之际，第二野战军主力，在刘、邓首长领导指挥下，在十一月初待命集结于鄂、湘、黔边地区，在北起长江、南至岳水，横宽千里的正面地段上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拉开了向大西南进军的战幕。二野五兵团和三兵团一部，首先向黔东之敌防线发起强攻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猛行动，一举突破敌人防线，当即兵分多路乘胜追击，翻山越岭，涉险强

渡，战胜重重阻力，直捣敌后，于十一月十五日，五兵团十六军健儿攻克了贵阳市及其东北石阡、思南等重要据点，将“大西南防线”拦腰斩断。此后又分兵三路向西追歼逃敌。

在此同时，我另一路大军二野三兵团主力和四野一部，分兵两路，向防守在川、鄂、湘的宋希濂集团实施钳击，在发起攻击的两日之内，突破敌两翼防线，攻克了秀山、思施等地。宋部在我军猛烈打击下，弃阵而逃，其七十九军的五个师在咸丰附近全部被歼。宋希濂率残部西窜。这个经过苦心经营的川鄂湘防线不到二十天已土崩瓦解了。蒋介石见状，心焦如焚，曾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阻挡我军西进，于是，急调罗广文部协同宋希濂残部，共据乌江西岸。同时，命川东守军孙元良部放弃奉节、万县，向重庆龟缩，重庆不保则撤往云南。为不使敌有逃脱机会，好歼敌于四川境内，南线我军各部日夜兼程西进。五兵团主力一部，在攻克贵阳、思南、遵义、毕节之后，挥戈北上入川，一举攻克叙永、江安、泸州、宜宾等地，切断了敌南逃之路。十一月二十七日，三兵团主力，在突破川鄂湘防线之后，以日行二百华里速度向川南推进，攻克了綦江、江津，扫除了重庆以南外围防线。沿长江西进的五十军等部，攻克彭水、石柱之后，由涪陵北渡长江西进，一举解放了垫江。这就形成了对重庆合围之势，这一形势的发展，出乎蒋介石的意料。他就一方面急调宋希濂、罗广文、孙元良残部固守山城，并命胡宗南第一军日夜兼程到渝，企图迟滞解放军进入重庆。另一方面，准备进行疯狂破坏，炸毁电厂和工业重要设备，留下空城。当此阴谋尚未实现时，我十一军健儿突临重庆南岸，蒋军如惊弓之鸟，纷纷溃逃。市内工人、职员、学生及其他爱国人士，在地下党的组织推动下，积极行动起来，护厂

护校，维持治安，迎接解放。十一月三十日，重庆上空升起了五星红旗。这个西南最大的政治、经济中心，回到了人民的怀抱。

但令人惋惜而沉痛的是，在我军进入重庆市前几日，被关押在白公馆、渣滓洞的三百余革命志士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他们虽未看到解放，但他们的坚强革命意志，慷慨就义的革命精神，给解放军战士以极大的鼓舞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杀敌勇气。

我南线部队，自十一月初发起西南战役起，到十二月十日止，连续作战四十天，前进三千余华里，歼敌八万余人，生俘敌十四兵团司令钟彬，提前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的任务。

佯攻后击，胡宗南中计

扼守秦岭、巴山地区的胡宗南集团，在我南线大军于川黔作战之初，尚自恃兵多将广，装备精良，妄图利用险要关隘进行顽抗。当时，我北线大军，为不使胡宗南过早发觉我作战意图，故佯攻不破，以骄纵、麻痹敌人，抑留更多的敌军、不使其过早向成都撤退、向西南窜逃。狂妄自大的胡宗南不知是计，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：“任你共军多少人马，休想翻过秦岭！”他吹虚秦岭防线万无一失，“共军多次猛攻，无一处可突破。”但直到南线大军解放贵阳、遵义、赤水之后向川南迂回进军时，胡宗南始觉不妙，唯恐后路被切断，于是从十一月中旬开始从秦岭撤军，向成都集中。北线我军，为保持与南线大军协调作战，对南逃胡军，不过份追击，仅用小股部队尾敌佯攻，拖住其后腿，将胡宗南三个军抑留于秦岭地区。待南线部

队完全切断成都之敌向西康逃跑之路，关上大门，再出击南下。十二月上旬，南线部队神速攻占了内江、富顺、隆昌、彭山等地，对聚歼成都之敌，态势已经形成。于十二月五日，北线大军十八兵团附一野第七军，在贺龙司令员以及李井泉、周士第同志率领下，兵分三路，迅猛追击，南下入川作战。以六十一军为左路，经郿县、江口，翻秦岭，攻城固，再越大巴山。当时，大雪纷飞，道路泥泞，地冻天寒，行动极为困难。但我军勇士在“红军能走过的道路，我们一定也要走过”的号召鼓舞、激励下，先头部队以三天半的时间，走完了八天的路程，终于赶上了南逃之敌的九师之众，仓惶之敌不战自溃，沿途消灭不少敌人，直追至中江城下。右路为六十二军，先扫陇南残敌后，开辟入川道路，翻山越岭，连续作战，追敌七昼夜。武都守敌一一九军，在副军长蒋云台率领下，有两个师参加了起义，为我军南进开辟了通道。当先头部队抵文县时，因摩天岭道路冰封受阻，后续部队改道碧口、青川，沿崎岖峡谷前进，追敌至江油、中坝、安县、什邡，于成都城下。以六十军为中路，沿川陕公路追击南下，攻留城，占褒城，取汉中，夺剑门，在此歼守敌一个团，进绵阳直逼成都。由兵团指挥的第七军，在天水兵分两路，协同三军作战。北线各部自南下追击以来，共歼敌八万余人。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北线各军已各自预定位置。蒋介石的最后一支“王牌”、胡宗南集团及其他残部军队约二十万人马，被驱赶至成都狭小范围之内，面临聚歼的厄运。

蒋胡奔逃 成都解放

在我军向西南进军开始，中央军委、毛主席就明确指出，在军事打击敌人的同时，必须兼用政治方式——即“北京方式”去争取瓦解敌人。刘邓首长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，于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向川康、云、贵四省的国民党军、政要员发出四项忠告，号召他们：停止抵抗，投向光明，悔过自新，立功赎罪。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，在中共的政策感召和争取教育下，愿意和国民党反动派划清界线，放弃内战立场，投向人民的一边。十二月九日，云南省主席卢汉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，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、潘文华诸将领，分别在昆明、雅安、彭县宣布起义。蒋介石闻此消息，惊恐万状，欲早日脱逃，于是把西南大权统统交给胡宗南，玩个金蟾脱壳之计，于十二月十日带着他的“政府”和美国顾问们，灰溜溜地爬上了飞机，向台湾逃之夭夭，他在西南地区建立反共基地的美梦彻底破灭了。

当卢汉、刘文辉、邓锡侯等将领起义后，在成都地区受我大军严密包围的“川鄂绥署”副主任董宗珩率领十六兵团在金堂宣布起义。胡宗南知此消息后，将受命重托的喜讯冲刷到九霄云外，然而他故作镇静，为稳定军心，十六兵团起义的第二天，在新津召开了军以上干部紧急会议，他说：“本人已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”，要大家“团结一致，抵抗到底”。并且具体研究部署了向雅安、西昌突围的行动计划。哪知翌日，这位在两年前攻占延安、不可一世的“常胜将军”，也像蒋介石一样，甩下他的部下爬上飞机溜之乎也。

在胡宗南溜走以后，国民党部队军心更加不稳，又有不少高级将领先后步入起义的行列，如：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，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，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，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等。只有接替胡宗南指挥权的十五兵团司令官李文，仍执迷不悟，集中了他手下的七个军，由成都分三路向双流、新津方向突围。李文亲自督战，高喊：“拚光亦光，不拚亦光，冲呀！”其顽抗丑态，溢于言表。只是李文错打了如意算盘。当他率部突围前，我南线大军十军、十二军、十六军、十八军及五十军的兄弟部队，正在成都西南地区构成铜墙铁壁，严阵以待，对李文突围之军迎头痛击，通力合围，使其四处碰壁，纷纷败下阵来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李文率残部万余人向我军举起白旗。此间，逃至大邑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三个保安师，看到李文兵团全部被歼，亦感到走投无路，也放下了武器，接受解放军收编。当我南线大军在成都西南围堵敌军时，北线大军猛击逃敌，锐不可挡，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乘胜解放了成都，两大军会师成都郊外，二十余万胡军全部被歼。入川作战的第二阶段胜利结束。

十二月三十日，在贺龙、李井泉、周士第等首长率领下，六十军进入成都，举行了胜利的入城式，受到数万市民的热烈欢呼。

西昌解放 西南战役全面胜利

为消灭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地区的最后一支残留部队，于一九五〇年三月中旬，我四兵团十四军、十五军、桂滇黔边纵和六十二军主力，又发起西昌战役，南北夹击。经过二十余天奋